

美丽中国与环境社会学研究

——2018年第六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卢春天,刘萌,李一飞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摘要:中国环境社会学自创立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在此基础上,第六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围绕“美丽中国与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召开,参会者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从不同层次和维度探讨了绿色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的呈现机制、环境公正、环境治理和“美丽中国”建设等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会者的研究成果既有扎根本土的分析,又有全球的理论视野,体现了跨学科的交叉融合,进一步凸显了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政策应用性,为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机制提供了借鉴作用。

关键词:绿色社会;美丽中国;环境社会学;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X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9)02-0095-10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环境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逐步形成了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在此背景之下,第六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20—21日)在西安召开,从学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来探讨学科发展和当前环境问题。本届会议由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及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主办,西安交通

大学社会科学处、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社会学系承办。来自全国各地众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期刊编辑部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届研讨会。此次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继在北京、南京、青岛、厦门成功举办之后,第一次在中西部地区召开,标志着中国环境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从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向经济相对落后的边陲地区传播,对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西部地区环境社会学的整体研究。

收稿日期:2019-01-09

基金项目:西安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SK2018048)

作者简介:卢春天(1978—),男,福建龙岩人,教授,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边燕杰教授在致辞中强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重大”也就带有根本性的意思,这也说明了环境社会学和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性。边燕杰教授以曾分析过的 CGSS2003 环境社会学数据模块为依据,指出 21 世纪之初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较强,83% 的城市居民对包括空气污染、用水卫生等 12 大环境问题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但与此同时,仅有三分之一的人意识到环境问题严重,从而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环境保护行动,较高的环境意识和较低的环保参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令人担忧。10 年之后的 2013 年,新的 CGSS 环境社会学模块数据表明,这些情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换句话说,如何从较高的环境意识及问题感知转向更多的自觉环境保护行为,仍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通过梳理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历史脉络,结合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边燕杰教授呼吁学者们关注环境研究的关系视角。

在本次研讨会上洪大用教授和陈阿江教授分别做了题为《绿色社会的兴起》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机制研究》的主题演讲。本届会议按照论文主题设有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垃圾分类与回收、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环境运动与环境抗争、邻避研究与环境正义、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水-人-环境、灾害研究、环境风险及其防治、环境治理与美丽中国、大气治理及其指标评价、区域治理与绿色发展 12 个分论坛。

一、理论研究与学科发展

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既要充分体现社会学的视角,同时还要有清晰的反思意识,不断扩展社会学的想象力^[1]。首先,学科的发展不仅要有扎根本土的研究,还要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的新特点,更应当有自己的理论解释框架^[2]。陈阿江教授(河海大学)针对我国环境问题提出解释框架,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从环境史的角度看,要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化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污染是否能够被恰当地呈现,对污染是否能成为社会问题至关重要。环境问题在社会学的研究历程中有两类倾向:一是环境问题被排除在社会问题研究之外;二是把环境问题等同于社会问

题,即无差别地对待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在陈阿江教授看来,将环境污染转变为社会问题,既受制于科学技术,也受制于当地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与问题化中要注意两类问题化事件:一是具体的环境污染事件的问题化;二是宏观社会结构与总体性环境污染的问题化。其次,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借鉴国际视角,张玉林教授(南京大学)探讨了人类与环境问题的时空尺度。借鉴了 2000 年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的定义,“人类世”的到来表明人类已经成为改变地球系统新的地质力量,其环境影响从生态圈扩展到生物圈,并且刻入了地质层—岩石层,他认为这个概念对环境社会学富有启发意义。

任何学科发展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下的产物^[3],当代中国正处在第二现代性条件下的风险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也正处在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具体来说,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原来的高度集权为匹配的计划经济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转型,以原来的单一的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为主要特征的观念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加剧了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导致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具有特定的社会特征^[4]。张磊等(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指出,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化,环境治理的对象、目的、原则、手段和模式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转型。我国环境管理转型的研究和实践应该在开放式环境治理的语境下来探索环境国家的构建,为我国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创新的空间。现实中的问题也需要建立复合生态系统的跨学科理论框架以及满足不同数据/信息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她介绍了两种基于系统观和整体论建构的环境问题理论视角: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环境流理论,并梳理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环境流理论、环境枢纽理论、社会实践理论以及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呼应的远程耦合模型及上述理论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各自的特点和在我国城乡环境治理研究领域的应用前景。针对当前环境保护运动全球扩展的趋势,刘萌(西安交通大学)梳理了世界社会理论在环境研究领域的应用。与生态现代治理

论有所区别,世界社会理论并不认为环境改善是技术创新或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着眼于跨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和规则扩散的角度来探索为什么环境保护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责任^[5]。

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世界的疏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问题^[6],而且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关注的问题。耿言虎(安徽大学)指出人与自然疏离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时间型疏离、空间型疏离、功能型疏离和文化型疏离4种类型。“人-自然”疏离有深刻的现代性根源,与市场分工、城市空间、现代科技和认知体系关系密切。与自然疏离削弱了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切断基于真实体验的环境知识积累、侵蚀环境归属感与认同感、阻碍环保投入和亲环境行为。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生态环境运动,它是西方左派力量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下做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应^[7]。王书明(中国海洋大学)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述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来源。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即生态优先、社会公正、非暴力和基层民主原则。这些思想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

环境意识是环境行为的先导。公民生态环境意识的培育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8]。居民的环境意识和行为对环境保护及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环境关心是指个体“意识到并支持解决涉及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或者为解决这类问题而做出贡献的意愿”^[9]。环境关心发源于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知和主观感受,是在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个体的价值选择^[10]。本次会议中,研究者们关注环境关心和行为在性别以及年龄方面的差异,并对环境行为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深入探析。李沐童(浙江大学)发现大学生环境价值观存在年龄和性别差异,价值观在其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相对男性大学生,女性大学生环境价值观有更强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在孙莹(中国人民大学)看来,环境关心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也是环境政策落实的社会基础,性别早已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二元的、固定的概念,而应当被看作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多元的、流动的概念。因此应在综合现有测量工具的基础上发展多元性别测量工具,社会建构视角下的性别测量工具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在环境行为研究方面,刘馥榕(西安交通大学)比较中美公众在公共领域环保参与行为的数据后发现:中美各项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都不高,不到20%,其中两国环境游行的参与率最低,都没有超过6%,但是相较于美国,中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参与率更低,并且发展态势不容乐观。中国公众的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相较于5年前有大幅度下降,而美国则有小幅上涨。鉴于未来生态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构建以家庭为单位、亲子两代共同参与的环境行为互动机制十分迫切。吴真(山东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在青少年家庭中,代际环境行为互动并不对等,其中亲代对子代的教导较强,子代对亲代的“反哺”偏弱。另外,在多个影响因素中,平等、开明的代际关系能够对亲子环境行为互动起到明显的正向作用。因此,在打造家庭环境教育体系时,一方面应先从父母的环境行为入手,形成“大手拉小手”的引导模式;另一方面也需改善日常代际互动方式,营造“小手拉大手”的交流氛围,以达到提升两代人环境素养的目标。

面对诸多环境问题,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还需要公众自下而上地在观念与行动上的转变,主动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与绿色行为^[11]。如何激发公众的绿色行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黄佳钰(厦门大学)发现中国公众环境行为的参与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环保效能感对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均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且环保效能感对“全面性环境行为型”公众的影响效果最大。吴灵琼(南通大学)试图通过开发和测试一个扩展的价值-信念-规范模型来拓展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现有认识,研究发现利己主义价值观对NEP的影响不显著。作为模型的情感基础,对自然的热爱主要通过生物圈价值观、生态世界观和个人规范依次影响绿色消

费行为。刘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将环境行为拓展到企业环保行为的研究,通过实地观察环保升级改造过程,发现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环境政策迫使企业为获得恢复正常生产许可而改善其环境行为。但是,在执行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小微企业的参与功能弱化和基层政府的行政区划管理固化限制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改进程度和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此外,还有研究从政商关系入手考察企业的环保投入,陈宗仕(浙江大学)从制度主义和资源依赖视角出发,发现政商关系影响了企业的环保投入。企业与政府关系越密切,就越可能增加环保投入;企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和环保投入之间呈现倒的“U”形的关系,而且这个模式有着地区的差异。

三、水与环境关系研究

随着土地流转的推进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农业转型。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构建和谐的人水关系是在良好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12]。陈航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通过引入“人与环境”关系的视角,揭示出了农业转型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水资源攫取。该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基层政府的推动,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本地农户的妥协态度。随着人水关系的重构,村庄共同体的生态基底开始受到冲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农户家庭生计的脆弱化和村庄共同体的“虚空化”。随着农田水利管理体制的结构转变,农田灌溉管理权力被重新分解,形成了一种地方政府、水管局联合治理的新模式。然而,赵素燕(太原科技大学)基于实地研究发现灌区农田水利治理呈现出地方政府负责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水管局负责灌溉管理的“脱嵌型”治理特征。在农田水利管理过程中,一方面,水管局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性质定位使其面临“谋利型经营者”与“代理型经营者”之间的角色冲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又不得不通过水资源“买卖”维持单位运转和人员开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项目逻辑造成其对农田水利的错位治理,而压力型的政治体制与维持社会稳定的任务要求又使其深陷农田水利纠纷解决之中。最终,农田水利服务供给陷入

困境。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支配水资源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但一些“人类自己制造的麻烦”却随之衍生^[13]。现代水利建设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打破了原来长期以来的人水和谐关系。冯燕(陕西师范大学)认为现代水利建设因缺乏综合规划配置,布局不合理,又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新疆干旱地区利用水资源最为经济、有效的水利工程——坎儿井水量不断减少甚至干涸。自来水取代坎儿井饮用水源的高级功能,彻底割裂了坎儿井与村民的亲密关系,人们遂转向使用它纳污的低级功能,人水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公众关于坎儿井的用水规范、价值观念发生改变,维护工作懈怠,使得新疆绿洲农业面临“资源性”缺水和“功能性”缺水的双重风险。重建和谐的人水关系,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类似的,传统渔业技术在当今社会也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杨柯(江西社会科学院)通过对鄱阳湖流域鸬鹚渔业的考察,发现鸬鹚驯养、捕鱼技术呈现了渔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适应;鸬鹚渔民身份地位、业缘关系呈现了农业社会人与生态互动和生态文化传承;鸬鹚渔村的衰落和城市化进程加强了工业化进程中环境资源的阶层化趋势。从鄱阳湖流域鸬鹚渔业发展、变迁和消亡过程可见,人类的环境行为呈现出与环境资源、社会关系和人类文化的“互嵌”历程。对鸬鹚渔业的研究可以多元视角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四、邻避运动与环境正义

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邻避时代”也迎来了它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城市社会随着单位制的式微以及社区运动的兴起,邻避等城市公共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日益增多,中国式邻避冲突因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的特殊性而备受学者们关注^[14]。张曦兮(蒙特利尔大学)对邻避的概念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应该突破“邻避”标签的局限性,从一个更加积极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应将地方性抗议活动的研究纳入城市研究的范畴,从一个更大的系统和背景中对这一议题进行考量。郑

旭涛(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认为“邻避”是预防型环境抗争的重要类型,而邻避这个概念无法解释预防型环境抗争中的空间差异,预防型环境抗争是比邻避更有解释力和适用性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预防型环境抗争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差异。近年来,中国不少邻避运动很多是大型石化PX项目引发的。杨江华等(西安交通大学)基于3个典型的PX项目事件的案例比较分析,重点研究了环境类集体事件中的网络动员和公众舆论信息生产的动态过程。

邻避冲突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由此产生的环境运动与社交媒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赋权,促进了公民与社会和国家间的互动,拓展了民主的政治空间^[15],但不同的媒体性质、媒体定位、报道引用角色、文章类型等会对环境运动传播效果产生影响^[16]。梁渊栋(中山大学)等通过对长达十余年、发生在广州市永兴村的邻避冲突与治理的考察,发现在邻避设施运营阶段发生的冲突相较于选址阶段发生的冲突更为复杂,同时村民行为和政府回应并不总是零和游戏,他们也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塑造的关系。在长期博弈过程中,政府能够在避免冲突上实现治理创新。卜玉梅(厦门大学)通过案例比较发现,组织和社交媒体在不同环境运动的决策和动员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由此构筑起网络时代环境运动的3种类型:组织驱动型环境运动,自组织型环境运动和媒介主导型环境运动。环境运动类型的生成是社会政治因素、网络技术因素与行动者主体因素多重约制的结果。社交媒体虽然具有实现行动决策和资源动员的可能,但从行动者组织选择的逻辑和基于社交媒体的行动网络存在的限度来看,组织的意义并未被消解,传统的组织形式也并没有完全被社交媒体所取代。

邻避本质上是公众对自身所处环境是否安全的一种回应。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出发,安全需求不仅包括了对食品安全的需求,还包括了对所处生态环境安全的需求。公众对环境安全风险的感知与判断往往是其邻避行为的出发点^[17]。李雪石(香港中文大学)探讨了替代食物网络作为民间解决食品体系危机的一种社会创新,AFNs机制是如何嵌入到我国现有食品体系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受哪些经济政治等物质层面影响?又受哪些社会心理、文

化层面的影响?面对危及基本生存和健康的各种严重环境危害,越来越多人选择移民海外或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国内经验观察和相关研究表明,环境污染是导致移民的因素之一^[18]。郭辉(南京林业大学)发现,当前新一波的环境移民潮具有一系列与传统生态移民迥异的特征,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其既是城市中产阶级为捍卫健康等权益所进行的柔性抗争,同时也反映出在强大的政经一体化格局中,中产阶级环境抗争的无力感。

五、环境风险与灾害研究

步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面临的灾害愈益增多。灾害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多样的、复杂的关联,甚至灾害本身可能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美国在二战后便开始了关于灾害的社会学研究,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社会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日渐受到学者们重视^[19]。李德营(山东理工大学)发现强烈关注经济增长的公共权力体系塑造了与煤炭相关的“煤炭政治”与“煤炭经济”。借助“煤炭政治”与“煤炭经济”所赋予的重要社会意义,煤炭开采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由此,煤炭开采行为迅速扩张,进而导致采煤沉陷灾害不断发生,凸显了公共权力与灾害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针对灾害问题,还需要从政治、经济角度予以解读,更为准确、全面地把握“人为灾害”。崔腾飞(山西农业大学)认为需要站在生活者视角下审视采煤沉陷乡村移民的历史进程,村民作为社区生活者必须应对社会关系解体、身份边缘化、生活重建、功能重组和生态恶化等风险。针对上述风险,该文试图提出“三位一体”综合治理机制、“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资源利用理念融入和居民生活环境选择的主体性提升等3条控制风险的原则。阿拉腾其木格(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则探讨了干旱区人工防雹作业的实施及其现存问题,明确了干旱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影响人工天气作业带来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影响。

无论是自然引发的还是人为导致的灾害,环境社会学家不仅关注他们的社会成因还有社会后果及其社会反应。袁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蓬莱19-3溢油事件为例,从环境建构主义视角分析该事件如何从“事件浮出水面”到“问题化”的这一过程,并

分析其中企业、政府、媒体、科学机构、社会公众和受损渔民群体在蓬莱 19-3 溢油事件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的社会行为,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这实际反映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复杂互动和博弈的结果。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超大城市防洪减灾形势越发严峻,孔峰等(中国气象局)从地理学角度分析了北京市 2012 年 7 月 21 日的特大暴雨洪涝灾害的致灾成因,重点分析了此次灾害应对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对超大城市的防灾减灾、人类活动等入地关系矛盾突出的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环境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进一步分析,王书明等(中国海洋大学)通过卡特里娜飓风事件的分析发现底层社会群体总是各种灾害的受伤者,以黑人为代表的底层群体,在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中不但是原生伤害的受害者,也是“次生伤害”的受伤者。“次生伤害”导致底层群体心理上产生排斥与对抗,生理上受到显著的和潜在的伤害,对生存环境的影响直接损害了底层群体的生存权利。

风险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全球化产物,人类当前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传统的自然风险,还包括更多工业化进程之后的现代化风险,但不论是自然风险还是现代化风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类需要面对的环境风险,而其中风险的分配更是引人关注^[20]。艾丽娟等(大连理工大学)认为目前中国环境风险分配存在极度的不公正问题,社会各个阶层在分配结果、分配过程和分配主体方面所面对的环境风险问题是不明确的,对环境风险损失的承受能力也不同,因损失而应得到的环境风险补偿也不同。因此,要进一步促进环境风险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对环境风险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完善环境风险追责和补偿制度,积极解决环境风险中存在的分配不公正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环境保护的研究重点转移到污染物进入环境之前的风险管理,环境风险评价这一新兴领域应运而生^[21]。唐金恺等(南京林业大学)认为传统环境管理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风险控制需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金融行业参与环保事业的重大尝试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环境风险分担机制。相对传统环境治理工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明显的经济性和有效性,设计优良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既能防控企业环境污染行为,

提高其赔付能力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能促进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优化,并通过其他绿色金融政策联动,形成新的绿色金融体系。

六、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

1. 社会多元主体与城乡环境治理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环境治理正在出现新趋势、新特点,已经迈向了面向整体环境、依托整体环境、为了整体环境的综合治理与社会变革的复合型环境治理新阶段,但当前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22]。其中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急需提升农村治理能力,推动农业生产模式和农村生活方式的系统性转变。李潇然等(中国人民大学)基于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内涵演变的深度解读,总结中国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历程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并结合国际相关经验特别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与荷兰农业发展模式,提炼出发展田园综合体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条件。田园综合体的发展应超越模式化,充分考虑各区域间的实际差异,尊重农户的发展主体地位,保证其过程参与及利益分享,同时还应具有市场适应性,最终呈现为多主体参与、多目标融合、多功能的综合适应性系统。戚晓明(南京农业大学)指出,农村社区环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治理的成效也反映了我国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治理水平。在新时代国家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背景下,通过典型案例重新思考和分析这 3 种方式在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的成效与限度显得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戚晓明提出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要“三治”结合,以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并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让德治贯穿治理全过程。

我国环境治理改革,不仅要重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更应充分保障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权及其环境利益。垃圾分类涉及每一位城市居民,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形成集体行动^[23]。通过垃圾源头分类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是解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的重要途径。王晓楠(上海开放大学)研究发现女性、年长者、受教育程度、家庭

年消费、小区类型、小区品质对公众生活垃圾分类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阶层认同、环境价值观、感知行为控制、感知行为动力对公众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感知行为控制作为垃圾分类行为内在驱动力赋予公众环境责任感及所具备的能力与技巧,阶层认同和环境价值观通过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增强公众垃圾分类的技能,克服垃圾分类的心理障碍,进一步激发垃圾分类行为。谭爽(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以我国27个垃圾议题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了保障条件、起始条件、过程条件、结果条件四大要素对城市垃圾分类中政社合作及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促使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包括:合作意愿、合作机制与上级支持。合作能力、目标契合、资源投入、外界反馈等因子则呈现组合效用,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根据地方政治环境、资源能力禀赋、自身发展阶段等特征选择适应性策略并灵活调整,从而有效推动城市垃圾分类,突破“垃圾围城”困局。

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密不可分,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邓玲等(华东理工大学)探讨了社区环境治理从自治走向共治的实践逻辑,其主要体现在社区认同、柔性动员、组织赋权及主体互嵌4个方面。居民的社区认同反映了居民参与的意愿,是自治的基础;柔性动员是通过社区骨干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作用;组织赋权是政府有选择性地向社会授权,实现社区资源的活化;主体互嵌则是不同主体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在治理实践中互联互动互惠,该实践逻辑是多重主体往复互动、不断互构的过程,有助于摆脱社区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困境”。此外,也有研究者展示了特定区域环境治理的研究,白惠舒(中国社会科学院)剖析了“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地方治理网络的运行机制及其对社会网络的嵌入性,发现“库布其沙漠”地方治理模式是由一个企业主导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生产企业及非正规工队以社会网络为主要纽带进行订单和任务分包而构建,并产生“嵌·套”的关系模式。

2. 大气治理及其指标体系

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保持较高的增速,目前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市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但人口大规模集聚带来的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经济增长引发的环境后果最终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发展,即经济增长产生环境和社会问题^[24];而生态现代化理论更加关注如何提高环境质量,而不是解释环境恶化,生态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25]。在上述两个理论框架下,王琰(南开大学)以空气质量为切入点,分析了人口和土地两个维度的城市化对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以及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的作用,发现在中等城市化水平的地区空气污染水平最高,在城市化水平较低和较高的两端污染水平最低。司开玲(江苏师范大学)通过文献梳理考察了“秸秆焚烧”被认知的图景以及思考这种认知构建所蕴藏的社会机制。在“秸秆焚烧”的认知图像中,政治力量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对“秸秆焚烧”的问题界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遥感监测等现代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秸秆焚烧”的治理,秸秆焚烧的空气影响获得越来越多的科学论证,而这种认知图像蕴藏了秸秆焚烧治理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农民在解决秸秆焚烧问题中的失语、以“空气”为中心的治理思路使得农村生态环境被切割等社会选择机制。因此,面对现代农业中综合因素所导致的秸秆焚烧问题,这些选择机制可能会加剧农村生态环境危机。

雾霾是一种复合型大气污染,因其化学组成的集大成性和影响人口之多,成为中国当前最紧迫环境问题之一。近年来,雾霾污染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雾霾问题的呈现过程与其他环境问题不同,既受到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外部压力,又受到国内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曾祥明(山西大学)从个人与社会关系变动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雾霾信息发布迟缓,PM_{2.5}这个概念突然出现带来的健康信息需求紧迫性,使个体分歧加大并使社会面临重构。受个体化现象的影响,个体与社会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不断拉大,使个体忽视自身雾霾贡献。齐晓亮(西安交通大学)从关中地区雾霾治理现状出发,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以系统全面性、简明科学性、切实可行性、典型代表性为构建原则,围绕经济绩效、资源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四大指标,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关中地区雾霾治理的绩效评价指

体系。同时,他认为雾霾治理必须将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转变为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新格局,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雾霾所造成的影响。

七、绿色发展与美丽中国

当今世界环境和资源问题非常突出,绿色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绿色发展,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任务。洪大用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主题演讲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是如何纳入环境因素并逐步迈向一个绿色社会,这里的绿色社会是指人类在认识社会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自觉推进社会变革,以谋求社会与环境相协调的一种社会过程和状态,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其具有弥散性、渗透性影响的重要特征。洪大用教授总结了推动我国社会绿色转变的五大动力:一是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环境质量面临严重威胁;二是人民需求发生重大变化;三是因环境损害(风险)而引发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日渐明显;四是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调整与主动作为;五是企业在环境衰退、人民消费偏好变化和政府的管制与治理投入中发现了新的盈利机会,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绿色行为倾向。在此基础上,洪大用教授提出要有两个基本态度:一是要充分认识到绿色社会建设方向的正确性,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变;二是要充分认识到绿色社会建设的局部性、过程性、阶段性和复杂性。

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需要宏观的顶层设计,另外一方面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细化考察。郑华伟等(南京农业大学)分析了农户视角下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绩效,为提高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在建立农户视角下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分析了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采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绩效障碍因素,发现江苏省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测度值为0.6085,绩效水平总体上处于“良好”等级。“河长制”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质量保证和重要的行政安排,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河长制”。吴垠等(宏调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采用

文献研究法,在新建的“四五五”模型的基础上,从横向、纵向和结构3个层次对指标项目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美丽中国”的系统化指标项的研究。这项研究对于单个学者或学术组织而言或许力量与视野有限,需要多学科专业机构的协同,同时具有战略思维的行政高层参与,其过程本身就更应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极大影响了公众的幸福感。公众幸福感与经济持续发展的这种非同步性逆向效应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且已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对居民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能有效提升居民参加环境行为的概率^[26]。代红娟(西安交通大学)发现居民的幸福感受到区域经济水平和环境污染的显著影响且存在区域间的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和随着经济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同时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先上升后下降。在东部地区,环境污染削弱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保持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关键。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东部先发地区的工业转型升级,出现了工业污染跟随资本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问题,工业污染及其社会危害跨地域复制的现象层出不穷,亟待解决。罗亚娟(湖州师范学院)认为污染企业区际转移的空间逻辑背后隐藏着特定的社会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展战略设计、制度设置以及资本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共同促成了污染企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走出污染企业梯度转移的困局,需要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对资本经济扩张逻辑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合理发挥“有形的手”的力量,理顺发展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为后发地区创造绿色发展的制度空间。

八、小 结

西部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和地域条件造就了丰富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资源,也蕴含了无穷的研究潜力。第六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安的成功举办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西部地区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本次会议设置了12个分论坛,

基本覆盖了在当前中央加快建设“美丽中国”背景下各类重要的环境议题。来自不同地区、院校及研究机构,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的参会者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的精彩发言与热烈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使环境社会学知识的生产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在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纵观本届学术研讨会所涉及的各项议题及学者们呈现的精彩成果,可以总结出本届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些特点,同时也能对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些经验、方向与趋势进行梳理与思考:

第一,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探索不断深入,总结中国经验、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本土化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关于学科发展与理论研究中,关注中国问题、扎根本土研究是学者们提出的首要任务,关于中国环境社会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已经走上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特色道路。学者们在本次研讨会中广泛关注中国环境问题,多方面多角度的进行研究,将环境问题置于中国社会结构与当前转型期的历史背景中思考,充分观察与总结中国环境治理经验,力图提炼本土化的理论与观点。在推动环境社会学本土化的同时,学者们的研究也更具全球化的视野,吸收与借鉴国外较为先进的理论与方法,采用全球环境叙事,利用主流的测量工具,并且更加重视在国际学术规范下进行创新、对话与交流,体现了环境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整合,未来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不仅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更应该走出去,面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二,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分支方向不断细化深入,研究对象的主体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学科整体研究的多样性得到极大丰富。本次学术研讨会涵盖了环境意识与行为研究、多种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研究、环境风险与灾害研究等 10 多个环境社会学研究议题,会上交流的学术论文 60 余篇,环境社会学“大厦”的建设无论是从地基、框架还是整体研究内容都有了明显提升。在环境意识与行为研究方面,学者们将关注对象由个体拓展到特定行业、企业,从以往只关注人的行为意识到聚焦企业这样的组织与群体的环境行为,进一步刻画了企

业在环境问题、政策上的具体实践,完善了整个研究链条。在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研究方面,学者们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场域下污染与治理的差异与特点,开展更细致、更精准的研究。

第三,中国环境社会学更加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更加贴近对制度与政策的解读与研究,美丽中国与绿色发展的理念得到充分贯彻。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中,无论是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还是关于环境运动、环境治理的研究,学者们都非常强调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与立足。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多元而开放,风险与机会并存,针对这样的社会结构特征,学者们对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环境困境。同时,在研究中,学者们也在力图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理解与解读政策导向,并对一些政策指导下的发展模式如“田园综合体”“四四五”等模式予以研究和分析。

第四,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时效性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凸显。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中,学者们对北京“7·21”特大暴雨、蓬莱 19-3 溢油事件等社会热点问题展开了研究。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加大,学者们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审视灾害问题,看到了灾害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多样的、复杂的关联,从多个视角对灾害问题进行了解读,对现有规划配置和布局的不合理之处也进行了分析,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绝不是于象牙塔内的故步自封、自我满足,而是真正切实关注环境问题,力图为环境的改善与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自身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建设正逐步迈向绿色社会建设,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涉及的环境热点问题与事件的关注,体现了中国环境社会学学者们对于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所做出的共同努力。

第五,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充分关注当前自媒体时代的环境传播特点。学者们既有研究新兴传播媒介对环境意识与行为的影响作用,亦有研究环境传播在环境事件与运动中的重要动员作用,同时还有研究各种环境传播媒介在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当下的信息化潮流与趋势

使得环境问题及事件的单一呈现形式变得多元且复杂,每个人在网络时代都有多样的渠道对环境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网络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传播介质,更多地呈现出工具化的一面。本次学术研讨会中许多学者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就深刻剖析了环境传播中媒介的作用,并表达了对未来环境议题中媒介传播使用的反思与期望。未来社会在技术与信息化的推动下势必会带来更多的环境问题暴露及解决的可能,而本次学术研讨会中学者们展现出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在经验研究中对新兴传媒的重视,无疑为未来的研究定下了良好的基调。

参考文献:

[1] 洪大用. 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J]. 思想战线, 2017(1):78-92.

[2] 林兵. 对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反思[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8):142-147.

[3] 董志锋. “环境—社会”关系与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郑杭生生态环境思想探微[J]. 社会学评论, 2017(3):65-75.

[4] 卢春天, 马溯川. 中日环境社会学理论综述及其比较[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3):72-80.

[5] 卢春天. 美欧环境社会学理论比较分析与展望[J]. 学习与探索, 2017(7):34-40.

[6] RESTALL B, CONRAD E. A literature review of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and its potential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5, 5(22):264-278.

[7] 董杰.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J]. 理论观察, 2014(12):13-14.

[8] 刘志娟, 李傲, 李楚瑛, 等. 公民生态环境意识测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生态经济, 2018, 34(6):217-222.

[9] DUNLAP R E, JONES R E. Environmental concern: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M]//DUNLAP R E, MICHELSON W.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2, 10(3):482-524.

[10] 王琰. 环境问题驱动下的环境关心:基于 WVS2010 的跨国多层分析[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4):48-56.

[11] 赵万里, 朱婷钰. 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隐喻——基于 CGSS2010 数据的实证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1):195-203.

[12] 陈阿江. 论人水和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0(4):19-24.

[13] 陈阿江. 治水新解——对历史上若干治水案例的分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1(3):1-5.

[14] 何艳玲. “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J]. 开放时代, 2009(12):102-114.

[15] 郭小平. “邻避冲突”中的新媒体、公民记者与环境公民社会的“善治”[J]. 国际新闻界, 2013, 35(5):52-61.

[16] 史敏. 媒体呈现环境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 12 家报纸对垃圾焚烧的态度为例[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5):49-60.

[17] 李小敏, 胡象明. 邻避现象原因新析:风险认知与公众信任的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3):131-135.

[18] 洪大用, 范叶超, 李佩繁. 地位差异、适应性与绩效期待——空气污染诱致的居民迁出意向分异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6, 31(3):1-24.

[19] 孙中伟, 徐彬. 美国灾难社会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2):218-241.

[20] 成伯清.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7(2):129-135.

[21] 毛小苓, 刘阳生. 国内外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进展[J].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2003, 37(3):266-273.

[22] 洪大用. 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3):67-73.

[23] 张莉萍, 张中华. 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居民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克服[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50-56.

[24] SCHNAIBERG A, GOULD K A.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the enduring conflict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v.

[25] 洪大用, 马国栋. 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1.

[26] 亢楠楠, 王尔大. 主观幸福感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J]. 统计研究, 2017, 34(5):82-93.

(责任编辑:吴玲)